

微型金融绩效研究述评

朱建芳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中国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大范围试点提出了如何对这些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绩效评价的现实问题,对已有微型金融绩效研究的回顾有助于回应这一问题。微型金融绩效具有双重标准,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缺一不可,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权衡关系。社会绩效可进一步区分为覆盖面与福利影响两个维度。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直接衡量指标具有多样性,绩效测度时既可利用指标直接衡量,也可以通过因子分析法、DEA 等方法来综合测度,两类方法各有优劣。福利影响评价研究的核心难题在于存在样本偏差,不同的评价方法因其对样本偏差的控制差异会带来不同的评价结论。

关键词:微型金融;覆盖面;财务绩效;福利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3-0038-06

一、引言

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简称 MFIs)是面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存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组织。由于其在过去 30 多年中取得的成效,吸引了数十亿美元资金投入其中,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也颁给了微型金融运动的旗舰——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及其创始人尤努斯。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试水小额信贷项目(微型金融的早期雏形),2005 年底颁布农村金融“新政”,包括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允许各地成立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至 2009 年年中,全国已成立 1 200 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绩效及金融“新政”的作用在未来一两年内将成为投资者、政策制订者以及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微型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业,其绩效具有双重标准,它既重视社会绩效,也关心 MFIs 本身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 MFIs 的客户覆盖面(Outreach),意即服务的客户数量及客户的贫困程度,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使命就是服务穷人;二是微型金融项目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Impact),包括与减贫有关的方面,如家庭收入、消费、投资增加,还有其他方面如教育、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财务绩效主要指 MFIs 财务上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也即盈利性,MFIs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否持续经营下去,或者说长期内营业收入能否覆盖操作成本与财务成本。微型金融绩效的双重标准产生了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孰轻孰重的问题。福利主义学派强调社会绩效,认为减贫、增加收入等目标是创设 MFIs 的初衷;市场学派强调财务绩效,认为盈利性是 MFIs 为穷人提供持续服务的前提。尽管长期内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性,但短期内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确有冲突与权衡^[1]。

由于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信息容易从 MFIs 的运行报告中获取,而福利影响在评价时需要专门调查及特别的评估方法,因此,绩效研究被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一是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评估研究,二是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由于

收稿日期:2011-03-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普惠金融体系的中国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绩效研究”(7090305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项目“农村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07JDQY001-3YB)

作者简介:朱建芳,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主要从事行为经济学、农村金融研究。

覆盖面也部分代表了社会绩效,因此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微型金融总体绩效的简易版研究。

二、覆盖面与财务绩效评价研究

覆盖面与财务绩效评价研究主要围绕绩效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任何机构或产业的绩效研究都会涉及这两个方面,但微型金融的情形略显特殊。与传统金融市场模式不同,微型金融认为穷人值得信赖,向穷人贷款可以取得盈利。因此,至今为止,微型金融绩效研究的焦点放在盈利性及覆盖面(客户数量与贫穷程度)的度量上,相对忽视了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测度

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定量测度有两种思路可供选择:一种思路是通过设计开发合适的衡量指标,直接对指标进行分析比较,以此判断 MFIs 绩效;另一种思路是综合各种绩效具体衡量指标,利用统计计量方法整合成单一指标来判断 MFIs 绩效。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第一种思路能够测度特定 MFIs 的绝对绩效,提供的绩效信息具体详尽,但由于绩效的多维度,如果不赋予合适的权重难以在多个 MFIs 之间进行同业比较、相对位置排序;第二种思路借助于统计计量工具,可以对 MFIs 绩效进行同业比较、排序,但其测度的往往是相对绩效。

直接测度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绩效衡量指标。但在绩效评价实践中,无论是覆盖面还是财务绩效,至今为止都还不存在一致公认的衡量指标。覆盖面可分成覆盖深度(Outreach Depth)与覆盖宽度(Outreach Breadth),宽度用来度量服务的客户数量,通常用具有未偿贷款的客户数量或未偿贷款总额作为衡量指标;深度用来度量服务客户的贫穷程度,其衡量指标具有多样性,比较常用的是人均贷款额度,该数值越小意味其所服务的对象越贫穷。另外,人均贷款额/人均 GNP、人均贷款额/最穷 20% 人口的人均收入以及女性客户比、女性客户贷款份额等都可用作覆盖深度的指标。财务绩效指标主要衡量 MFIs 的可持续经营能力。目前通行的做法是用资产回报率(ROA)、操作成本的自我充足率(OSS)及财务上的自我充足率(FSS)来衡量。操作成本自我充足率衡量的是 MFIs 通过运营收入覆盖操作成本的良好程度;财务上的自我充足率指机构的营运收入可以覆盖全部成本,或者说机构可以不靠补贴,不依赖优惠的融入资金也能持续经营。除此之外,实践中财务绩效衡量指标的选择余地非常广泛,比如世界银行曾提出与资产质量、效率和生产率、财务管理、盈利性相关的 14 个指标供评估者使用。

覆盖面与财务绩效评价中,有大量研究围绕微型金融旗舰——格莱珉银行展开,其中, Morduch 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全面分析微型金融的特点、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他认为 1985 - 1996 年间格莱珉银行的覆盖面绩效不断提高,其借款客户数量、年平均贷款额都有显著增长,但其财务绩效却令人

担忧。尽管报表显示账面利润稳步增加,但可能只是因为采用了特殊财务处理手段,实际上可能并未实现自身财务上的可持续性^[2]。

Cull、Demirgüç-Kunt 和 Morduch 用全球 49 个国家的 124 个 MFIs 的数据对微型金融绩效做了分析。从总体上看,超过一半的机构在会计调整后达到盈利性的水准,其余的 MFIs 正在达到盈利,应该很快就能实现财务自我充足率。另外,简单相关分析表明不存在覆盖面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权衡,提高利率不会影响还款率,能够同时实现盈利和持续覆盖较穷人口,即使在积极追求商业目标时也仍然可能履行初始社会使命。但是,如果将 MFIs 按照贷款技术(个体贷款、小组贷款、乡村银行贷款)分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就财务绩效而言,个体贷款组、小组贷款组和乡村银行贷款组平均资产回报率分别是 0.01、-0.05 及 -0.08,显然只有个体贷款组的 ROA 为正,数值也较小;从覆盖绩效的各个指标来看,这些指标包括女性客户比例、人均贷款额/人均 GNP 以及人均贷款额/最低收入 20% 人口的平均收入,数据显示乡村银行贷款组服务的客户最为贫穷,其次为小组贷款组,个体贷款组服务的客户最不贫穷。总体统计量表明,乡村银行和小组贷款组的成本之所以如此高(相对于个体贷款组)是因为他们发放较小额度的贷款以及服务于更穷的客户。因此,财务绩效与覆盖面之间存在矛盾关系^[3]。

中国小额贷款事业起步较晚,国外学者对中国微型金融项目的研究并不多。Park 和 Ren 按照政府参与项目的程度把小额贷款项目分为非政府项目、混合项目与政府项目,对比分析这三类项目的绩效,认为覆盖绩效从高到低依次为混合项目、非政府项目、政府项目;财务绩效从高到低(以还款率为标准)依次为非政府项目、混合项目和政府项目^[4]。

中国学者从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小额信贷的绩效问题。何广文、李莉莉分别从机构和农户两个层面评价中国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的绩效。其中,机构绩效主要体现在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两方面;农户绩效主要体现在农户“贷款难”问题的缓解及农户增收两方面,另外,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和 NGO 小额信贷的案例研究表明,财务上的可持续与覆盖面两大指标比较适用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对 NGO 来说,由于资金实力较弱,覆盖面指标不太适用^[5]。杜晓山、刘文璞等人对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进行了多角度、广视角、全方位的研究,他们采用了两组指标(赢利性指标和生产效率指标)对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进行了可持续能力的评估,同时讨论了影响绩效的多种因素^[6]。焦瑾璞、杨骏对中国小额信贷进行了整体(行业)研究。他们将小额信贷分成两种,一种为非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即未获得“金融许可证”的组织项目,包含 NGO 和政府小额信贷),另一种则是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指扶贫贴息贷款、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和正规商业银行的小企业贷款

等。从总量和覆盖面来看,政府小额信贷和 NGO 类型小额信贷微不足道,正规金融机构是小额贷款的主力军。从可持续性角度看,非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财务状况不佳;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中,农行扶贫贴息贷款持续性很差,不良贷款率达到 70% (2004 年数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小额贷款业务本身则是可持续的^[7]。

覆盖面与财务绩效分属两个不同的绩效维度以及两者之间的权衡关系导致难以对 MFIs 绩效进行同业比较,不过,近年来开始出现利用统计计量手段进行同业比较的某些尝试。Giovanni 和 Sylvain 选取 6 个体现 MFIs 覆盖绩效和财务绩效的相关变量,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对日内瓦 45 个 MFIs 绩效进行同业比较及排序,进而研究了绩效的影响因素^[8]。Begoña、Carlos 和 Cecilio 利用 DEA 方法衡量了微型金融机构的效率或绩效。他们利用 2 个投入指标(放贷官数量、操作费用)、3 个产出指标(索取的利息及费用收入、总贷款资产、未偿贷款的数量(笔数))构造了不同的投入产出组合及相应的样本模型。在这些不同的 DEA 效率模型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拉丁美洲 30 个小额信贷机构的效率进行了排序,并揭示出不同机构效率差异背后的原因^[9]。

(二) 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微型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目前专门研究 MFIs 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献并不多见,仅有几份研究主要讨论公司治理及相关因素与绩效之间的联系。Hartarska 研究治理机制对财务绩效与覆盖面的作用。在控制 MFIs 各自特征、国别制度及宏观经济因素的情况下,考察了董事会特征、CEO 补偿激励等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审计、评级和管制等外在治理机制各自对财务可持续性、覆盖深度与覆盖宽度的作用及其综合作用。研究发现一个更为独立的董事会将会在资产回报率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但董事会中股东代表对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不同偏好将对绩效有不同影响,比如,更多的捐赠者代表将有较好的覆盖率及较差的财务绩效。外在的治理机制比如审计、评级和管制,其作用比较有限。研究表明对经理人员基于绩效的补偿激励与 MFIs 更好的业绩不存在相关关系;使命驱动组织的较低工资会带来较低的覆盖率,而经理人员的经验将提高 MFIs 的绩效^[10]。

Cull 等将重点放在贷款技术的分类上,同时考察了 MFIs 的财务绩效和覆盖面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使用个体贷款技术可将财务绩效提高到某一水平,因此建议 MFIs 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体贷款。他们在研究中未考虑如董事会特征或所有权类型这些治理变量^[3]。

Mersland 和 Strøm 在考察治理机制与 MFIs 绩效

关系时,同时关注了市场竞争、客户—公司关系等因素对绩效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进行的随机效应估计表明,当董事会成员中本地人所占比例越高、拥有内部审计董事以及女性 CEO 时,财务绩效越好。当 CEO 同时兼董事会主席的情况下,覆盖面绩效会提高。个体贷款技术与小组贷款技术相比,前者的覆盖绩效较小。另外,非盈利组织和股份公司这两种不同的微型金融组织形式在财务绩效和覆盖面上不存在差异,银行规制没有对绩效产生作用^[11]。

三、福利影响评价研究

福利影响评估是微型金融绩效评价中最具争论与挑战的领域。从理论逻辑上说,微型金融确实具有提高客户福利的渠道或途径,微型金融服务(贷款、存款等一系列金融工具)可以允许客户以扩大产出、投资更具效率的资产组合、平滑消费等途径提高家庭收入、消费水准和投资水平,进而带来其他方面福利的提高。但是,客户福利的变化不仅受金融服务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如何识别微型金融服务对福利变化的贡献或称因果识别成为福利影响评价中的核心难题,不同的识别方法将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福利影响评价领域内的激烈争论。

微型金融的福利影响是通过“有一无”对比法来评估,即比较有微型金融项目时与没有微型金融项目的差异^①。常用的方法是把项目参加者(被试组)与一群类似的非项目参加者(对照组)进行比较,但要找到具有“充分可比性”的对照组非常困难。所谓“充分可比性”是指这些个体除了没有参加项目外,在其他方面与参加者完全相似,这一条件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实现。原因在于:首先,微型金融项目的参加者往往具有自我选择性,这种自我选择性不仅可能表现在财富、年龄等可观测特征上,也可能表现在“企业家精神”等不可观测特征上;其次,微型金融项目的落户地也是有意选择而不是随机产生。因此,样本偏差或者缺乏“充分可比性”的对照组是困扰福利影响研究的最大障碍,而福利影响研究的演进脉络也基本上沿着样本偏差控制方法的改善而展开。

(一) 存在样本偏差的典型研究

最早评估微型金融项目福利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是 Hossain 开展的工作,他通过对格莱珉银行成员与非成员的比较,发现格莱珉成员的平均家庭收入要高出控制组(没有格莱珉银行的村庄中的家庭)43%,比格莱珉银行所在村的具有成员申请资格却未参加的家庭平均收入高 28%^[12]。这种通过比较微型金融项目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差异的方法在当时微型金融社会福利研究中比较流行,但由于控制组选择上的缺陷,Hossain 自己也认为这一研究结

^①也有学者采用“前—后”对比法来评估福利影响,即通过比较客户在项目参加前与参加后的差异来估计福利影响。这样的比较未能控制其他因素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由此得出的评估结论显然存在偏差。由于这一方法不是福利影响评估中的主流,笔者略去讨论。

论高估了微型金融项目的福利影响,因为与控制组相比,格莱珉银行的成员(被试组)更年轻,拥有更好的教育,控制组中的家庭更多的是无地者^[12]。

在 AIMS 项目的推动下,世界各地掀起了微型金融机构福利影响评价的高潮。在 AIMS 框架下,研究人员主要通过比较新老客户的差异来评价项目的影响或作用。这一方法的潜在思想是既然老客户与比较对象(新客户)都选择参加项目,因此他们的“企业家精神”这一不可观测的特征没有差异,故而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为项目的影响。不过, Karlan 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比较仍有缺陷,其所估计结论存在偏差。一是因为 MFI 机构服务的客户类型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比如,一个 MFI 机构开业时非常谨慎,在分支机构开设到更穷的区域之前,它服务的对象是较富裕社区,早期选择的成员与那些后面才能加入的成员存在差别;二是客户的退出问题,或许只有那些从项目中获益的客户才会留在项目内,那些从项目中受损的客户已经退出项目,不考察客户退出的情况,只比较留在项目中的老客户与新客户之间的差异将使评估结论产生偏差^[13]。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AIMS 发起的“核心作用评估项目”强调利用纵向时间序列数据、非客户控制组及更大的样本^[14]。“Chen 和 Snodgrass (2001) 比较了从 SEWA 借款的客户与在 SEWA 有存款却没有借款的客户,以及这两者与非客户控制组进行了比较,发现借款者收入比存款者高出 25%,比非客户控制组高出 56%;存款者收入比非客户控制组高出 24%。这一结论表明微型金融无论对存款者或借款者都是相当有效。Barnes (2001) 发现 1997 年客户收入比那些其他组别显著要高,但到 1999 年时两者间的差异就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尽管继续留在项目中的客户仍然赚得最多。Dunn (2001) 发现 Mibanco 的客户比非客户的年家庭平均总收入要高出 266 美元,等等”^[14]。从总体上来看,AIMS 组织的众多福利研究结论显示微型金融的福利影响存在多样性。不过,由于评估的基础方法存在缺陷,研究结论的应用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二) 利用“准实验”控制样本偏差

在微型金融福利影响研究中,Khandker 本身的研究以及他和 Pitt 合作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他们首次尝试利用“准实验”的方法对样本偏差包括项目地点的非随机选择问题进行了仔细考虑^[15-16]。借助于世界银行和孟加拉发展研究院 1991-1992 年收集的与格莱珉银行、BRAC 和 RD-12 项目相关的 1 798 户家庭数据,利用一个复杂的所谓“外生抽样最大可能性加权法—有限信息最大可能性—固定效应”的计量模型,评估了微型金融的福利影响,得出了后来被经常引用的核心结论: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女性借款者每 1 塔卡借款能够增加家庭平均支出 0.18 塔卡,即借款的收入回报率为 18%^[16]。

不过,这一研究立刻遭到 Morduch 的强烈质疑。

由于 Khandker 和 Pitt^[16] (下文简称为 PK) 只有一年的截面数据,故而需要利用工具变量来控制样本偏差。考虑到在孟加拉有资格成为微型金融项目成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人均土地拥有量少于半亩,因此 PK 利用土地拥有量作为工具变量来纠正样本偏差。但 Morduch 发现,在实践中,研究中的微型金融项目成员中有 20%~30% 的人,其土地拥有量超过了这一门槛值。另外,Morduch 认为 PK 的计量模型的初衷是要纠正项目地点偏差但实际上却是加重了这一偏差。Morduch 用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并未发现借款能够增加家庭平均支出的证据,因此 Morduch 认为格莱珉银行的福利影响被夸大了。不过,他的研究结论证实了 PK 关于微型金融能够平滑消费的结论^[17]。

在福利影响研究中,利用“准实验”控制样本偏差的成功代表是 Coleman。他利用泰国乡村银行的扩张计划在那些没有微型项目的村庄中做了一个准实验,在乡村银行开张之前,与那些符合项目申请条件又有兴趣的村民事先签约,以此构建具有相同“企业家精神”的控制组,尽管控制组中的村民实际上并没有给予贷款。通过该模型,Coleman 比较了两个组别。一是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天真”的比较),另一类是纠正样本偏差后的正确组别间(参与者小组与控制组)的比较。结果发现,“天真”的比较显示出信贷具有正作用,特别对那些拥有土地的女性会员来说作用更大,因为乡村银行的成员一般较富。第二类组别间比较则发现信贷对有形资产、储蓄、销售及教育支出都没有作用^[18]。Alesander 分析 AIMS 对秘鲁 Mibanco 的纵向调查数据时采用了 Coleman 模型的思路。类似地,她发现不考虑自我选择的“天真”的估计将高估影响^[19]。

(三) 利用面板数据控制样本偏差

面板数据是另一种可用于控制组间初始差异,纠正样本偏差的方法。针对 Morduch^[17] 的质疑,在世界银行和孟加拉调查中心对 1998/1999 年微型金融项目进行了再次调查后,Khandker 利用 1991/1992、1998/1999 组成的面板数据和改进的模型,再次评估了格莱珉银行的福利影响。这次研究所得到的福利影响比 1998 年的研究结论更高:女性借款者每增加 100 塔卡的借款,将带来 20 塔卡的年度家庭总支出的增加,男性借款者的借款则根本没有任何回报。研究同时表明微型金融项目对贫困率下降的作用非常明显^[20]。

尽管 Khandker^[20] 的研究被广泛引用,但其非随机的样本选择始终令人对其结论的有效性抱有些许怀疑。Roodman 和 Morduch 利用相同的数据、相同的方式,使用接近于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模型分别对 PK^[16]、Morduch^[2] 以及 Khandker^[20] 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检验,三种检验结果都表明不存在正的社会福利效应^[21]。不过,Roodman 和 Morduch 认为这并不表明小额信贷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而是说

明在某种程度上工具变量策略的失败。相反的因果关系或者重要的缺省变量也会产生这样的结论,研究中发现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借款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符号及大小随二次抽样的不同发生变化。更进一步地,他们质疑 PK^[16] 采用准实验识别因果关系的数据基础,并说明 Khandker^[20] 使用面板数据并不能弥补实验组缺少明显的外生变量的缺陷。这些都说明已有的方法不能可靠地度量微型金融项目的社会福利影响^[21]。

(四) 利用随机实验控制样本偏差

解决样本偏差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利用随机试验,它能保证除了干预事件以外,被试组从平均上来说与控制组完全一样。经济学领域中随机实验方法应用的日益增多为检验微型金融项目的社会福利影响提供了新的方法,近几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随机试验研究。Karlan 和 Zinman 在南非的消费者信贷市场上研究信贷是否有助于福利改善,与之合作的现金放贷者随机选择批准贷款的申请,同时追踪调查申请者的借款活动、贷款用途及一系列相关福利指标。结果发现:南非消费信贷市场上确实存在有约束力的流动性约束;信贷有助于包括家庭消费在内许多方面的福利提高^[22]。

Karlan 和 Zinman 在菲律宾采用类似方法研究传统小额贷款对家庭小生意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贷款能够提高借款者利润,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男性借款者而言,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较高收入的男性借款者而言。另外,盈利的提高似乎来源于业务收缩,从那些更小具有更低成本的企业那里观察到盈利的提高^[23]。因此,他们对小额信贷应将目标锁定在女性和微型企业家而把男性与工薪者排除在外的政策提出了质疑。

Banerjee 等在印度城市海得巴拉进行了一个小额贷款的传统随机试验。该项研究包括 104 个贫民窟的样本。随机选择 54 个贫民窟开立 MFI 分支机构,对贫民窟住户发放贷款,另外 50 个贫民窟则仍然没有 MFI 机构发放贷款。项目运行 15 ~ 18 个月后,检验发放贷款对于小生意的开设、盈利性、投资和消费的作用。结论包括:小额贷款对人均月消费没有作用,但耐用品消费确实有提高;项目开始时就已做生意的家庭会投资耐用品,利润得到提高;有较大可能成为生意人的家庭非耐用消费降低;有较小可能成为生意人的家庭的非耐用消费增加;对健康、教育及女人决策地位提高没有作用。总之,在短期内,小额贷款没有产生有时宣称的那种奇迹^[24]。

(五) 其他方法的尝试

鉴于社会福利影响因果关系识别上的困难, Hartarska 和 Nadolnyak 从另外的视角来研究微型金融的影响。从直接的理论逻辑来看,微型金融项目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的直接结果应是融资约束的缓和。因此,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样本中,研究微型企业的融资约束是否因微型金融项目而改

善。根据融资约束理论,微型企业如果可以得到更多的外部贷款,其投资将更少地依赖于内部资金,其研究结果表明 MFI 减缓了微型企业的融资约束^[25]。与传统的微型金融项目社会福利影响相比,融资约束分析方法可以避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因为它不再依赖控制组与被试组的选择,另外它考察的是整个微型金融产业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单个 MFI 机构。因此,这一方法在评估微型金融项目的作用时具有自身优势。

当然,微型金融项目的社会福利作用并不局限于收入、消费等这些经济指标,还包括教育、健康、女性权力甚至避孕工具的使用等方面,这些研究同样遭遇到因果关系识别上困难。总体上而言,此类不严谨的研究大部分显示出了微型金融项目的正面效应,有关这方面的综述详见 Goldberg^[26]。

四、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微型金融绩效评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微型金融实践的发展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将会进一步推动研究向前发展。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可能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要更多地重视随机实验在福利影响评估中的作用。社会科学领域中内生性问题非常严重,依赖非随机化的研究难以精确度量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经济学、田间实验等新的方法应更多地引入微型金融领域。

其次,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倡导的“微型金融行业财务透明”行动推动下,MFIs 的绩效指标日益具备统一比较的基础。完备充分的数据信息允许研究者对 MFIs 进行更好的同业比较。考虑到绩效指标的多维特征,利用 DEA、因子分析法等统计计量分析方法来进行绩效研究应是一种发展方向。就中国而言,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规定,经营得当、绩效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当地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村镇银行金融牌照。因此,如何更好地对绩效进行同业比较与排队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实际问题。

最后,福利影响的评价结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因此不能排他性地仅依赖某一种评估方法。就控制样本偏差的各种方法来说,各有优劣,比如随机实验需要高额成本及专业知识,面板数据方法需要搜集大量信息,费时费力,而准实验方法也并不轻易能够实现。未来的评估研究中,应该根据需要采取适当方法。

参考文献:

- [1] ZELLER M, MEYER R. The triangle of microfinanc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utreach and impact[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 MORDUCH J. The microfinance promis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37(4): 1569 - 1614.
- [3] CULL R, DEMIRGÜC-KUNT A, MORDUCH J. Financial

- performance and outreach: A global analysis of leading microbanks[J]. *Economic Journal*, 2007, 17:107 - 133.
- [4] PARK A, REN C Q, Micro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1):39 - 62.
- [5] 何广文, 李莉莉. 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 [6] 杜晓山, 刘文璞, 张保民, 等. 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7] 焦瑾璞, 杨骏. 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 [8] GIOVANNI F L, SYLVAIN W.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EB/OL]. (2006 - 10 - 20). [2010 - 05 - 25]. http://www.hesge.ch/heg/CRAG/doc/pub_wp_sw_01072006.pdf, 2006.
- [9] BEGOÑA G N, CARLOS S C, CECILIO M M.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and efficiency[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7, 35:131 - 142.
- [10] HARTARSKA V.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10):1627 - 1643.
- [11] MERSLAND R, Strøm Ø. Performance and governance in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9, 33:662 - 669.
- [12] HOSSAIN M. Credit for the alleviation of rural roverty: The Grameen Bank in Bangladesh [R]. Washington, D. C. : IFPRI , Research Report No. 65 , 1988.
- [13] KARLAN D. Microfinance impact assessments: The perils of using new members as a control group[J]. *Journal of Microfinance*, 2001(2):76 - 85.
- [14] GOLDBERG N.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Taking stock of what we know [R]. Washington, DC: Grameen Foundation USA, 2005.
- [15] KHANDKER S. Fighting poverty with microcredit [M]. Dhaka, Bangladesh: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1998.
- [16] PITT M, KHANDKER S. The impact of group-based credit programs on poor households in Bangladesh: Does the Gender of Participants Matte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5):958 - 996.
- [17] MORDUCH J. Does microfinance really help the poor? New Evidence from Flagship Programs in Bangladesh [R]. Princet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1998.
- [18] COLEMAN, BRETT. The impact of group lending in north-east thailand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60:105 - 42.
- [19] ALEXANDER, GWE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icrofinance: Who are the clients [C]//Paper presented at 2001 Northeastern Universities Development Consortium Conference, 2001.
- [20] KHANDKER S.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Evide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Bangladesh [R].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5.
- [21] ROODMAN D, MORDUCH J.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the poor in Bangladesh: Revisiting the evidence [R].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174 , 2009.
- [22] KARLAN D, ZINMAN J. Expanding credit access: 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s [EB/OL]. [2009 - 05 - 22]. <http://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p/site/m/template.rc/1.9.25770/>, 2006
- [23] KARLAN D, ZINMAN J. Expanding microenterprise credit access: 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s in Manila [EB/OL]. [2009 - 09 - 10]. <http://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p/site/m/template.rc/1.9.37303/>, 2009.
- [24] BANERJEE, A, DUFLO E, GLENNERSTER R, KINNAN C. The miracle of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EB/OL]. [2009 - 08 - 22]. <http://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p/site/m/template.rc/1.9.34827/>, 2009.
- [25] HARTARSKA V, NADOLNYAKM D. An impact analysis of microfinanc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12):2605 - 2619.
- [26] GOLDBERG N.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Taking stock of what we know [R]. Washington DC: Grameen Foundation USA, 2005.

Review of Microinaince Performance Research

ZHU Jianf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 R. China)

Abstract: How to evaluate commercial microloan company performance has been a real task with the wide emergence of commercial pilot microloan company in China. The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on microfinance performance will help to respond to this issue. Microfinance performance is twofold, including social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but there may be trade-offs between the two. Social performanc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outreach and impact of two dimensions. Outreach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can be measured directly by many indicators, also can be indirectly measured by factor analysis, DEA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measure. These two kinds of methods both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mpact assessment has a core problem of sample bias. The result of assessment varies with the method to control sample bias.

Key words: microfinance; outreach; financial performance; impact

(责任编辑 傅旭东)